

论翻译无确定的标准

游振声,姜治文

(重庆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 翻译标准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关翻译标准的新“术语”大量涌现,争论旷日持久。作者发现,这些新“术语”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差异,争论毫无意义。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给翻译定一个或几个衡量的标准。

关键词: 翻译标准; 争论; 因素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03)06-0067-03

Stop Seeking a Definite Criterion for Translation

YOU Zhen-sheng, JIANG Zhi-we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Translation criterion has long been the target of all disputes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The past few decades witnessed a noisy world dense with new terms intended as translation criter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uch endless new-term-centric disputes will lead nowhere and all attempts to fix a criterion for translation will end up a waste of time, because translation involves a lot more factors than we can set a definite criterion by.

Key words: translation criterion; disputes; factors

“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用不同语言的人要达到交流思想、相互了解的目的,就必须通过翻译作为中介手段。《礼记·王制》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作为具有如此悠久历史的活动,翻译理应已经发展成一门很成熟的学科。可事实上,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史、2000 多年翻译史的国家,人们对翻译的争论却此起彼伏,莫衷一是。

一、翻译的标准

何为翻译?“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话语)在保持内容,即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巴尔胡达罗夫);“所谓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奈达);“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正确无误地、恰如其分地转移到另一种语言文字中去的创造性活动”(彭卓吾)。

何为标准?《汉语大词典》给“标准”的定义是“衡量事物的依据或准则”,“榜样、规范”。显然,翻译标准则是指用以衡量译文质量优劣的标尺,它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同时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心课题。

长期以来,围绕着这个中心课题,许多有识之士早就展开

过多次激烈的争论。佛经翻译大师支谦的翻译“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隋代名僧彦琮提出“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清代魏象乾提出“不增不减,不颠不倒,不待取意”。近代严复首倡的“金科玉律”“信、达、雅”被奉为圭臬。林语堂在《论翻译》中提出了翻译的“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傅雷对翻译提出了“神似”的观点。陈西滢提出翻译应该力求做到“原文所有,译文也有;原文所无,译文也无;一分不加,一分不减”。王佐良先生提出“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钱钟书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境”。在翻译时既不因语言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这是翻译的尽善尽美的境界。近年来,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论更是可以车载斗量。张今针对文学翻译提出了“真善美”的翻译标准。陈宏薇将语言的功能概念引入翻译的标准,提出翻译的标准应为“意义相符,功能相似”。冯志杰根据信息论的观点,提出翻译的二元基本标准是“信息等价性”和“信息传递性”的再现。吕俊认为翻译应该做到不违背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在翻译界最耀眼的当推刘重德的“信、达、切”,许渊冲的“三美”说,范仲英的“感受论”,郑海凌的“和谐论”以及辜正坤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再看看国外翻译界对翻译标准的关注:18 世纪英国的泰

收稿日期:2003-09-02

作者简介:游振声(1964-),男,重庆垫江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特勒在《论翻译的原则》中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翻译的“三大原则”;苏联费道罗夫提出了“等值论”;巴尔胡达罗夫提出了“语义等值”论;奈达提出了“功能对等”。翻译标准的讨论似乎成了一个永远找不到答案的话题。

二、影响翻译标准的因素

(一)翻译目的的差异

根据德国学者 Vermeer 提出的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即结果决定方法。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某种翻译目的的需要,译者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如下例:

Susan and Shelley saw seashells on the seashores.

译文 1:苏姗和雪莉在海边看见了贝壳。

译文 2: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

从字面上看,第一个译文忠实于原文而第二个译文却与原文没有丝毫联系。但从语言的使用目的以及翻译的目的上分析,这两种译文或许都是成功的。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英文句子的字面意义,我们当选用第一个译文;如果原文是供练习[s]和[ʃ]这两个音素用的(Note: Eight words constitute the sentence with an obviously dense frequency of the sounds [s] from s and [ʃ] from sh),这就类似汉语中练习“四”(sì)和“十”(shí)的绕口令,那么第二种译文就非常精当。

(二)文体的差异

任何一种语言的作品,都存在文体上的差异,不同的文体要表达的重点不同,翻译的标准就有所不同。纽马克的文本范畴理论为我们看待翻译的标准的问题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根据纽马克的文本范畴理论,不同类型的文本需要不同的翻译标准:表达型文本的翻译既要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又要忠实于原文的语言风格;信息型文本的翻译要忠实于原文的“真实性”;号召型文本的翻译则要忠实于读者的反应。诗歌语言精练,有意象、有节律、有鲜明的风格,翻译诗歌要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舞台剧本的重点是人物对白,对舞台对白的翻译要适应人物形象、说话时间的长短以及口型的需要;政治文章必须充分反映原著者所持的政治立场;广告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打动读者、诱发其消费欲,广告的翻译标准应该是在功能对等基础上的等效原则。“科技文章的翻译,要求做到象数学公式那样的准确”;公文文体多注重风格的庄严和结构的严谨;新闻报道多注重内容的简洁和语言的感染力;法律语言翻译标准可以概括为准确、规范、通顺。

(三)文化的差异

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社会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研究表明,语言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则是无可辩驳地客观存在的。因此,翻译并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活动,从根本上来讲,它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充分考虑文化的差异,在译入语中作适当的调整,才能有效地传达原作的信息。例如: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Version 1: There are three unfilial conducts; no posterity is the greatest.

Version 2: Of three kinds of ungratefulness to one's parents, the

greatest is not to have a male descendant.

在汉语语言文化中,“无后”通常指的是没有儿子、孙子,只有女儿、孙女者仍被视为“无后”,这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汉语中的“无后”不能译为“no posterity”,因为“posterity”所指的“后代”是不分男性和女性的“后代”,因此,“无后”中的“后”宜译为“male descendant(s)”,使其本义得以准确的表达。当然若为了更多地关照目的语读者,当选择第一个译文。又如:

癞蛤蟆想天鹅吃(《红楼梦》)。

Version 1: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 (杨宪益)

Version 2: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the goose in the sky”. (霍克斯)

杨宪益先生用“swan”来翻译“天鹅”从而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而霍克斯用“鹅”(goos 的形象,替代了“天鹅”(swan)的形象,是为了适应英美读者的审美观。因为在英美文化中,“鹅”和“天鹅”具有完全不同的联想意义。

又如汉语说“胆小如鼠”,英语翻译成“as timid as a hare”;汉语里说“对牛弹琴”,英语说“to cast pearls before swine”;汉语说“挥金如土”,英语说“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人建议,既然汉语能容下“鳄鱼的眼泪”和“武装到牙齿”等翻译,那又缘何不可以弘扬我们的文化,让外国人学学“as timid as a mouse”(胆小如鼠)呢?

(四)时代的变迁

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任何人的思想、语言、行为无不深深地打上其所处社会、时代的烙印。翻译的目的总是为一定的社会服务的,因而翻译的标准也总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例如:

Wholly untaught, with faculties quite torpid, they seemed to me hopelessly dull: and at first sight, all dull alike; but I soon found I was mistaken. I found some of these heavy-looking, gaping rustics wake up into sharp-witted girls enough. (Jane Eyre Volume III, chapter VI)(6)

译文 1:她们全没有受过教育,心智十分麻木不仁,在我看来,是笨得没有希望了;我发觉这些张着嘴的笨样乡下人中,有几个倒觉悟过来,成为十分伶俐的人了。(李彗野 p451)

译文 2:她们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官能都很迟钝,我觉得这些人笨得无可救药。我便发现一些神态呆滞、目光迟钝的乡巴佬,蜕变成了头脑机灵的姑娘。(黄源深 p336)

在李译本中,“torpid faculty”变成了“心智十分麻木不仁”,“wake up”变成了“觉悟”。李彗野不可能不理解原词的意思,他的这种有意的误译与当时(1930s)中国人民正在与旧的社会制度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黄源深将“torpid faculty”译成“官能都很迟钝”,把“wake up”译成“蜕变”,这样的解释符合 90 年代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时期的中国的读者的情趣。假如黄源深的译本也将“torpid faculty”译成“心智十分麻木不仁”,“wake up”译成“觉悟”的话,读者很容易由此联想到早已尘封的阶级斗争。

(五)读者的要求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即原语)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即译语)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意思,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范仲英)。纽马克在他的 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 中指出:同样一篇原作,翻译给 12 岁的孩子看和翻译给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看,语篇的重组就要有所差别。换句话说,读者对象不同,翻译时的指导思想就应该有所不同。为了使译文能最大程度地被读者理解,译者必须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有关情况,如受教育的程度、年龄、宗教信仰等。

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生命力,也没有意义,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或许正是因为对目标读者的重视,奈达先生在他后期的学术著作中将译人语“target language”之提法换成了“receptor language”。“Receptor language”的提法顺应了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兴起的接受美学理论,它指出读者并不是消极的读者,而有其能动的作用。

有人要求从上述译文中挑选一个最佳译文。试问,不考虑读者的已有知识水平就妄断孰优孰劣,这合理吗?假设在老年扫盲班上,我相信“作用与反作用相等,但它向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或许是最佳的、最容易让读者理解的译文;当然,若读者是已经具备相关物理知识的中学生,则“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是最佳选择。

(六)译者的介入

文学作品是作者创造的语言符号世界,文本一旦产生,作者便退居幕后,剩下的就是读者对作品的解读。由于生活经历、艺术修养、才情人品、文化水平等的差异,“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正如观看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不同的审美主体对同一审美对象会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首先是读者。他首先必须对原作进行解读,然后将自己对原作的理解转达给新的读者。不同的译者,由于经历、背景、文化修养等的差异,加之译者通常带着某种预想或偏见走近原文,他们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要用同一标准去评价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显然是荒唐的。

三、结语:翻译无确定的标准

上列译例表明,翻译的标准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影响其标准的因素很多。许多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如德里达的意义播散和延异理论,胡塞尔的意义意向性理论,加达默尔的解释哲学的对话理论,都说明了意义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也说明了文本的意义不是自然存在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既然意义没有确定性,翻译就更不应该有确定的标准。

在着手翻译一篇文章时,译者必须考虑翻译的目的、目标读者群、目的语的环境文化等。同样,当我们在评估一篇译文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将翻译的目的、文体的差异、文化的差异、时代的变迁、读者的要求、译者的不可避免的介入等纳入我们评估的视野。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世间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处于某种相对运动状态。因此,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尺数就只能是个不确定的量。试问,当这种所谓的“标准”多得不计其数时,还有必要连篇累牍地争论不休吗?笔者以为,翻译并无

确定的标准,也无必要为此标准而争论。

参考文献:

- [1]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 [2] 辜正坤. 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EB/OL]. 中国翻译网,2003-09-10.
- [3] 郑海凌. 翻译标准新说:和谐说[J]. 中国翻译,1999,(4):2-6.
- [4] 叶定国. 论翻译标准的多元性[J]. 郑州大学学报,1999,(2):46-49.
- [5] 卢树. 论翻译标准的具体化[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7,(3):97-101.
- [6] 宋天锡,等. 英汉互译实用教程[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0.
- [7] 程镇球. 政治文章的翻译要讲政治[J]. 中国翻译,2003,(3):18-22.
- [8] 骆乐. 浅谈社会因素对翻译标准选择的影响[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1):76-78.
- [9] 赵德远. 文学翻译标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4):87-90.
- [10] 徐华莉. 翻译标准的变迁[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2,(2):118-120.
- [11] 张萍. 社会文化环境与译者的选词[EB/OL]. 中国翻译网,2003-09-15.
- [12] 苏淑惠. 广告英语的文体功能与翻译标准[J]. 外国语,1996,(2):51-56.
- [13] 杨文伟. 对翻译标准的再思考[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2,(4):50-51.
- [14] 董力. 翻译标准在争论中发展[J]. 语言与翻译,2002,(2):35-38.
- [15] 王金安. 论翻译标准与“信达雅”[J].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3,(1):105-107.
- [16] 熊兵. 翻译标准研究综述[J]. 高等函授学报,2000,(4):5-8.
- [17]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 [18] 辛献云. 从纽马克的文本范畴理论看翻译标准的相对性和多重性[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2):74-76.
- [19] 钱正福. 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J]. 苏州大学学报,1999,(2):135-137.
- [20] 颜宁. 翻译标准新思考[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6):73-75.
- [21] 吕俊. 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的翻译标准问题[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3):41-45.
- [22] 肖让见. 论翻译中读者的地位——兼谈翻译标准[J]. 淮北煤师院学报,2002,(2):93-95.
- [23] 李彤. 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及其继承与发展[J]. 忻州师院学报,2000,(1):39-40.
- [24] 卢澄,等. 从“目的论”来看翻译标准[J]. 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56-59.
- [25] 彭治民. 论翻译标准的不唯一性[J]. 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1):71-72.
- [26] 游振声. 理解:翻译的灵魂[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3):27-30.